

精英高校中的农村籍学生* ——社会流动与生存心态的转变

谢爱磊

[摘要] 针对正在高校中学习的、处于社会流动过程中的学生的生存心态转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领域。对四所“985工程”高校/“985平台”高校的追踪调研分析表明,在农村籍学生进入精英高校环境后,在学业方面,其既有的生存心态与新的机构环境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匹配,其不适应主要来自于社会生活方面。旧有生存心态与新的机构生存心态的“连续性”和“断裂性”,让我们在分析那些较为成功的农村籍学生时观察到两条基本的规律,即“连续性”所带来的安全感和自信可以成为他们拓展新的领域、实现自身生存心态转变、逾越“断裂性”的重要机遇,但“连续性”似双刃利剑也可成为阻碍农村籍学生生存心态转变的重要阻力。

[关键词] 精英高校;农村籍学生;生存心态

[作者简介] 谢爱磊,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长春 130024)

一、背景与问题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尽管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在不断扩张,但在重点大学尤其是名牌高校,来自农村地区的大学生的比例却有实质性下降。^[1]2011年前后,在教育部门的有力推动下,我国重点高校开始设立专项名额,面向农村贫困地区招生。这一措施有力地推动了重点高校农村籍学生^①在数量上的增长。有统计数据显示,从2012年开始,我国重点高校农村籍大学生在数量上的增长速度达到10%左右。^[2]在持续的社会转型和市

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针对高等教育机会和个人流动机遇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宏观的社会分层变化及其对城乡居民高等教育机会的影响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话题。对处于社会流动过程当中农村籍大学生的研究,尤其是针对他们在精英高校环境中适应过程的研究,却不多见。零星的针对不同群体大学生进入高校之后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社会背景对他们将来社会流动机会和职业地位的影响。

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常被看作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实现转变的重要机遇。教育社会学研究需要开辟新的视角,深入微观过程,探讨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我国985高校在校本科生的社会背景与其学业成就和学习体验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3YJC880085)的研究成果。

① 文中农村籍学生指家庭常驻地为农村地区的学生,即户口所在地为“县城以下”。

来自社会底层的学生在社会流动过程中宏观社会结构与个体生命历程的互动关系,进而探讨这种互动关系对其社会流动机遇的影响。针对高等教育机构中处于社会流动过程当中的学生,对他们生存心态^①转变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已有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在大学生活中,较之城市籍学生,农村籍学生会产生一定的“自卑情绪”。就这种自卑情绪的成因,不少研究者试图作出概括。有研究者将其成因概括为较差的消费能力或是缺乏与城市籍学生相当的文化消费品位和鉴赏能力。^[3]有研究人员将其概念化为文化自卑,亦即来自于农村文化群体的学生会感到其群体文化较其所进入的城市文化更低级,因此,当进入大学、跨入新文化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内心的冲突。^[4]

对农村籍大学生自卑情结及其背后成因的追问,指向城乡关系及其背后不平等的权力格局。其背后的隐喻是,既然学校是一个肩负着社会化职能的机构,即帮助下层子弟实现向中上层社会的流动;那么,在文化上,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抛弃自己原来较低层次的阶层文化,习得新的中上层的文化,进而实现所谓的“融入主流文化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考虑,自卑情结自然与其出身的阶层文化被看低有关。不过,这一隐喻至少要以下列两个条件为前提。一是在主流的文化与出身的文化之间存在着对立或者至少截然的不同,在学生进入高校那一刻起,他们跨入的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场域。二是学生生存心态的相对静止,在进入高校之前,农村籍学生的态度、倾向等一直没有发生变化。而这两点,正如笔者在后文所揭示的,都值得怀疑。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一项大型的追踪调查。在该研究中,我们以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策略选取了四所来自不同城市的“985

工程”高校/“985平台”高校中的近二千名2013级本科学生,并开展了一项历时三年的关于他们学习与生活经历的追踪研究。笔者将交替使用通过访谈所获得的质性数据和通过调查所获得的定量数据。具体数据呈现策略是“大质小量”,即以质性数据为主、定量数据为辅的策略。该策略有助于更好地回答本文提出的核心问题:农村籍大学生在进入精英大学环境之后的生存心态是否会发生改变,生存心态的改变抑或不变是否必然导致由于出身的阶层文化而带来的自卑情结。

大学生进入高校环境学习的过程常被看作在文化和心理上适应新环境的过程。在社会学研究的话语体系当中,这个过程常被概念化为一个新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过程。近年来的教育社会学研究尤为关注高等教育机构的文化属性,弱势群体学生进入高等教育系统尤其是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学习的情形,常被教育社会学研究人员视作“文化上的外来者”进入新的文化环境的过程。在研究者看来,外来者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场域,常常面临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挑战是生存心态与环境之间的错位——这是生存心态转变的基本动力。新的场域会带来生存心态的转变吗?在不少研究者看来,生存心态是早期社会化的结果,植根于学生早期的家庭历史和学校教育经历当中,因而几乎不会发生变化。^[5]不过,最近十几年的教育社会学文献,对“生存心态可以转变”这一论点也开始有充分的肯定,既有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经验性的佐证。^[6]针对高等教育系统尤其是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中弱势群体学生生存心态转变的讨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实际上丰富了最近几十年关于生存心态之于个人社会流动意义的讨论。传统上,研究人员往往过于看重生存心态对于个人持续的社会流动的约束作

① 本文中的生存心态(habitus),尽管在国内不少研究中将其译为“惯习”,但本文还是采用高宣扬教授根据自己与布迪厄亲身交流的结果将其译作“生存心态”。

用,而轻视了其转变的可能性。但中外学者对布迪厄理论工作的重新挖掘以及新的实证研究的结论都告诉我们,生存心态的转变有其可能性,当然,这是有其前提条件的。针对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精英高校中农村籍学生生存心态转变的讨论有助于增进我们对这一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问题的认识。

二、数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一项在3所“985工程”高校和1所“985平台”高校所做的追踪研究。该研究为混合研究设计,包括了定量的问卷调查和质性的追踪访谈两个部分。问卷调查的基本目的是了解家庭背景对不同生源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和社会成就的影响,后续追踪访谈的目的是为影响机制寻得一个解释,这种设计即所谓的顺序解释策略(sequential explanatory strategy)。问卷调查部分,样本的选择采用的是PPS抽样(以概率比例规模抽样)策略,我们先选取了四所“985工程”高校,在选取学校时,我们尽量让其有一定的层次性,并能反映“985工程”高校类型构成的一些状况。在选取好学校之后,我们再结合每所案例学校的班级组成状况表,将班级按学院分入理科、工科、人文社科和医学四组,并从每组中随机抽取班级,被选中的班级,我们邀请全体学生参与调查。最终选中的学生样本近2000个。

在问卷调查结束之后,我们对问卷的调查结果进行初步的探索性分析。结合初步发现,按照学业成就和社会成就两个基本标准,从被调查的学生中选取了四组学生参与深度访谈。由于农村籍学生样本有限,在无法获得足够数量农村籍大学生参与访谈的状况下,我们联系了一些并未参加问卷调查的农村籍大学生进行访谈,但符合抽样需要。最终参与访谈的同学共80名(不含参与预调研的学生),每次访谈约一个半小时,每位受访

者接受访谈1~2次。

本文质性部分汇报的数据,主要来自那些学业或社会活动方面高于平均水平的学生(共24人),针对较为成功者的研究,有助于与国际主流的教育社会学研究进行对话,即近期的国际教育社会学研究力图结合较为成功者的经历,探讨进入精英环境的弱势群体学生生存心态转变的可能性。结合定量部分的数据,我们力争更为清晰地回答以下核心问题:农村籍大学生在进入精英的大学环境之后的生存心态是否会发生改变,生存心态的改变抑或不变是否意味着对所出身的阶层文化的贬低并随之产生了自卑情结。

三、研究发现

(一)“适应”与“不适应”

在教育社会学者看来,借助学校教育,脱离出身的环境,进入精英高等教育系统往往会遭遇各种冲突和不适,其背后的基本推动因素在于所谓的生存心态错位。在本研究中,不论是来自城市地区的同学还是来自于农村地区的同学,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到,刚一进入高校时会经历不同类型的“不适应”。不过,对于农村籍大学生而言,他们所提到的“不适应”并非体现在学业方面。

首先,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中的大部分肯定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学业对于自身的社会流动非常重要。谈及学业的重要性,一位来自南部某省的学生就提到:“觉得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是很对的,因为毕竟高中阶段你只有读书一条路,现在虽然学业不是全部,但你要有好工作,也还得看学业”。

其次,更重要和更本质的不同是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在学业和自己所出身的群体之间没有建构起直接的关联。不同于西方社会学界针对工人阶层子弟的研究,农村籍大学生并不认为所出身的社会群体有着“学业能力不足”的问题。^[7]在谈及学业时,受访的所有

农村籍学生都更多地将学业的成功与否归结于个人的勤奋与努力,认为学业成功与否和群体身份认同之间并没有多少关联。一位来自中部某省的学生提到勤奋和努力而非智力因素在学业成功中的重要角色时说,“反正我觉得大家的智商都差不多,(我)肯定要比别人稍微用功一些,但运气也有的……我们那里竞争很大的,你知道某某省考上来好多,有些人可以来,有一些人不能来,肯定是有原因的。班里肯定有一些人读书不太努力,有一些人就是读书挺努力的。”

受访者对于学业、学业成功的原因及学业对于个人社会流动意义的认识很大程度上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教育与个体社会流动关系的认知。这一点,从他们步入中小学教育阶段那一刻起即被学校教育系统反复强调。当然,社会行动者的认识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他们自身不断社会实践的结果。由于从农村考入重点大学的难度较高,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学生一般都颇为肯定自身努力的重要性和认可自身的学习能力。也正因如此,从进入大学那一刻起,他们不必面临所谓的学业成就负担——在学业成就与自身身份认同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8]

在访谈时,当农村籍大学生提及“不适应”、“花了点时间才适应”等感受时,他们所指的内容更多的是社会生活方面。在研究工人阶层子弟的大学生活时,不少研究者指出,他们有一种“如鱼离水”的感觉,^[9]其核心内容是指工人阶层的生存心态与精英大学环境不匹配。这包含两个核心内容,一是指他们对于学校中那些有着一定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活动缺乏必要的认识,即并不看重,认识不了其重要性或者持愤世嫉俗的反对态度;二是指他们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在进入大学之后,不知道如何更好地与同学交流,进而导致一定的隔离和较少地参与各类校园活动。在研究我国农村籍大学生的社会活动状况时,学生参与学生会、团委、班委及各类社团

的情况一直是研究者较为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些组织是大学生在高等教育机构环境中实现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本研究表明,对于参与这些组织,农村籍的大学生并不持反对的态度。不过,在刚步入高校那一刻起,对于这些组织的重要性,他们的确很少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在对于学生会或团委这类学生管理组织重要性的认识上尤其如此。在访谈中,大部分学生提到,在刚进入大学时,尽管这些组织也开展过宣传活动、鼓励他们参加,但对这些组织之于个人的意义,他们的确没有多少清晰的认识。在E校,一位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大学生在被问及是否参加过学生会或团委等组织时提到,“没有(参加任何学生会或团委组织),因为我觉得够了(没有必要再参加了)。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学生会的一个成员,(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参加学生会)没什么用,所以我就不参加了”。往往是在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之后,在我们开展后续的追踪访谈、邀请他们回顾之前一年大学的所得时,这些学生往往会指出自己当初在这一方面的不足,如一年级时没有充分地认识这些组织对于自身成长的意义。

关于农村籍大学生对参与校园中社会活动的认识,本研究另一重要的发现是,他们倾向于将自身构建为能力不足者。量化的数据显示,较之于城市籍学生,他们的确更少参与班委、学生会和团委等一般我们认为较有利于他们积累社会和文化资本的组织(在班委、院团支部、院学生会的参与率上,农村籍学生分别为18.4%、7.3%、24.2%和4.8%,城市籍学生的参与率分别为24.6%、12.7%、36.9%和8.9%,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显著)。对这些组织之于个体意义的认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另一层重要的原因是,受访的农村籍大学生往往倾向于认为自己不具备有关的知识 and 能力。例如,他们中的大部分较多地提到:参与学生会等组织需要通过面试等选拔,或者选拔时指明需要具备某些特殊的能力(如计

算机能力),而他们一般不知道如何为面试做准备,或者没有相关的技能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匮乏的确是他们参与这些活动的障碍之一,但相当重要的障碍在于农村籍学生在身份认同与社会活动的胜任力方面所建立起的部分对立的关联。接受访谈的大部分农村籍学生在谈及学生会和团委等工作时,一般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胜任相关的工作,或者没有通过面试等考核的可能。在中部省份的C校,一位农村籍大学生谈及自己没有参加任何学生会或者团委等学生组织的工作的原因时,她提到:“那时候……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自信,(不敢去报名),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好。但现在要我说的话,参加那些学生会之类的(组织)都会锻炼自己的能力,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从一些事情上面会学到很多东西。但现在我快要大三了,就没有机会做这些了。”

那些较少参与学生工作的学生,一般倾向于将社会工作和人际方面能力的匮乏(真实与建构的结合)归结为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家庭文化资本投资的匮乏。这种匮乏让他们在选择参与相关的学生组织时体现出一定的特性:他们中部分人想积极地社会化,更好地融入大学环境,掌握更多的技能,这样,那些不需多少门槛的兴趣类社团也就成了首选,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我们的量化数据显示在社团参与上农村籍大学生与城市籍大学生参与水平基本相当的原因(前者的参与率为54.2%,后者为51.5%,但差异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

(二)生存心态转变:“自在”的双刃剑

脱离原先的家庭环境,进入精英高校,融入一个所谓的整体性社会机构常被看作生存心态转变的绝佳机遇。对于来自底层社会群体的学生而言,他们所进入的机构,其机构生存心态代表的是更高层次社会群体的文化产物。对于来自社会地位较高社会群体的学生而言,既然机构生存心态与通过自身早期

社会化而习得的生存心态基本匹配,那么,他们感受到的应该是“自在”与“适应”,不必面临由于周遭环境的变化所带来的不安与内心的冲突。对于来自地位较低社会群体的学生而言,机构环境与自身的生存心态的不匹配必然带来不自在感和内心的挣扎。在我们的研究中,农村籍大学生的生存心态与精英教育机构的机构环境之间存在着部分匹配的状况,即学业方面的匹配和社会生活方面的不匹配。

数据分析表明,在面对学业时,农村籍大学生的确无须面对多少与城市同学不一样的压力,即不必面临学业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冲突关系。在谈及进入大学以后的学业状况时,农村籍的受访者所提的来自学业方面的挑战和城市籍学生所描述的基本一致,他们感受到大学的学习有了更多的自主控制的空间,更加依赖自身对时间的管理;在学习方式上,大学的学习和高中的学习也有了实质性的变化。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受访者表示他们依然觉得“自在”,认为所有人包括城市籍学生,在学业上面面临的挑战基本相似。而早期习得的针对学业的态度及获得较好学业成就的方法还让他们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故而充分利用旧有的方法,同时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例如,一位接受访谈的J校的农村籍大学生就提到,即便在面临诸如觉得大学的学习索然无味这类挑战时,依然能够应付大学学业的基本要求。

对于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学生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学业上的成功还是获得同辈认可和实现个人成功的重要途径。而这一看法,又被他们所在学校的机构文化所强化。例如,我们开展研究工作的精英高校一般都依然将学业成就作为衡量个人能力的重要标准;在评定奖学金时,依然将学业成就放在首位。这些都激励农村籍学生尽量维持一定的学业成就,并视学业的失败为“堕落”。受访同学在谈及学业时说,“假期里面就感觉这样

上大学、这样学习不好,感觉这样是不对的,一定要改变一下,一定要做出改变。放假的时候给自己的假期制定了一个计划,认为自己这个假期大一前一阶段没有学好的课程想再看一看。”

学业成功可以转化为个人继续向前的动力,成为个人尝试新的领域、拓展自己新的能力、实现生存心态转变的推动力,个人也可以借此克服“自身社会能力不足者”的社会建构。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学生多有提及,在学业上获得相当的成就之后变得更加自信,他们逐渐地拓展已有的领地,开始积极地从事学生会等管理工作。在文化生活方面,也开始逐渐地做出新的探索,推动自身文化品位的改变。接受访谈的一位女学生提到,进入高校之后,学业方面的自信让她开始“尝试”其他新鲜事物,学习钢琴和舞蹈。她认为,自身在很多方面和城市的同学变得日益相像,并开始尝试旅游、看音乐剧。当然由于经济能力的限制,她选择成本更低的方式来达至与城市同学符号意义上的相似,去较近的城市旅游或者在本市的景点逛逛。

在农村籍学生的生存心态和大学的环境之间的部分匹配,滋生了学生对自身能力的自信,并由此推动着他们做出新的改变,这一心理过程包含着对自身文化之中合理成分的认可。这种变化并不会带来所谓的“生存心态转变的隐性伤害”,即由于承认新旧文化之间的高低等级,而导致的“身份认同摇摆”;或者在新旧交替过程中,减少与旧有社区的感情联系,并承担随之而来的感情负担。在接受访谈时,参与者一般都表示不会刻意减少同父母和旧朋友的联系,在假期回归社区之后,尽管已经发现自身与所居住的社区居民在很多方面已经有所差异,他们还是能够选择合适的话题与朋友和邻居交流,并不会由于自身生存心态的转变而生成与旧有社群中人的紧张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心理负担。

本研究针对农村籍学生在精英高校适应

过程的分析,揭示的一种相当重要的适应类型或者策略是:当在学业上获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又被既有的机构环境所认可时,部分农村籍学生更加倾向于继续在自身较为擅长的学业领域做出努力,而不会轻易在社会生活方面做出新的拓展。例如C校一位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学生就提到,进入大学后,自己将精力几乎全部放在学业上,其他方面则不管了。当谈及生存心态的变化和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新环境时,她说:“我永远也不会变成他们(城市学生),我就是喜欢原先的样子”。

生存心态的部分匹配,一则可以让他们借助于熟悉感和规则的熟悉,保持自身成功者身份,维持自尊;二则为他们创造了一定的空间,规避来自不熟悉领域的挑战。来自S校的一位农村籍学生提到,进入新环境后,也曾尝试去参加学生会工作,但在初步的失败后,他索性“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让自己的精力可以集中在熟悉的学业方面。在接受访谈时,他半开玩笑也是无奈地说道:“那我只好做个学霸了”。当然,接受访谈的农村籍学生也能敏锐地感知当前精英高校和外界社会正在发生的新变化,学业逐渐不再被看作衡量个人成就的唯一指标。例如,开展调查的四所高校,几乎所有接受访谈的学生都提到,学校正在尝试综合地评价学生,在奖学金评定时会考虑学生的社会活动状况。因此,在学校里,光有成绩还不够。

四、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以在四所“985工程”/“985平台”高校的追踪调研为基础,采用以质性资料为主,定量资料为辅的混合方式呈现了研究的部分发现,并力求以此来实现与既有文献的对话,探讨其政策含义。

本研究的数据分析表明,当农村籍大学生进入精英高校时,他们旧有的生存心态与新的精英环境之间存在着“连续性”与“断裂

性”并存的状态。其具体内涵是指,在学业方面,他们不会面临太多的“不自在感”,在既有的生存心态与新的机构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匹配,这让学业的适应不成问题。他们所提的不适应主要来自社会生活方面。也就是说,既有的生存心态与新的机构环境之间存在着部分的不匹配,即在进入高校那一刻,他们并不了解大学社会生活方面的意义,并倾向于将自己构建为社会“能力不足者”——这是旧有的生存心态与新的精英环境之间所存在的“断裂”。旧有生存心态与新的机构生存心态之间的“连续性”和“断裂性”,让我们在分析那些较为成功的农村籍大学生时,观察到两条基本的规律。“连续性”所带来的安全感和自信可以成为他们拓展新的领域、实现自身生存心态转变、逾越“断裂性”的重要机遇,对于旧的文化场域与新的文化场域之间相似之处的肯定,也让他们的转变不必以承认城乡文化的等级关系为前提,这降低了他们的内心紧张以及可能的“生存心态转变的隐性伤害”,因此,不一定会产生自卑情结。当然,“连续性”是一柄双刃利剑,亦可成为阻碍农村籍学生生存心态转变的重要阻力。生存心态的连续性,可以让他们借助于熟悉感和对学业成就的掌握,保持自身成功者身份,维持自尊;也可以为他们创造一定的空间,规避来自不熟悉领域的挑战。

本研究以中国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为基础,研究发现和基本结论丰富了教育社会学文献中关于处于社会流动过程当中的来自社会底层群体的学生生存心态转变的讨论。我们以中国的文化背景为基础,强调传统的儒家文化传统和精英高等教育机构生存心态之间存在的一致性,即对学业的重视对于来自农村籍学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农村籍学生在进入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学习时,被内化的儒家学业态度价值观念是其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被教育机构反复强调的儒家文化的合理传统也可成为农村

籍学生可以借力的文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学业价值的纯个人的反身性思考,就不再是他们实现生存心态转变的唯一路径,而这却正是目前西方教育社会学文献较为强调的个人生存心态的转变路径。

本研究要强调的另一重要研究发现是,在进入精英环境时,农村籍大学生倾向于将自身建构为在社会活动方面的“能力不足者”。在身份认同与自身能力之间建立起的这种关联,需要从更为长期的学校和家庭教育差异去理解。这是城乡教育资源之间所存在的结构性差异部分地转变为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不同“生存心态”的结果。对于这一结果之于个人社会流动的约束作用,值得深入地探讨与追究。

不过,既有的社会学文献对此问题关注甚少,西方教育社会学中的类似研究也并未就此问题做较为深入的讨论。而深入学校教育的微观过程,探讨个人与学校教育机构之间的互动并探索这一生存心态的影响及其转变过程,正是教育研究视野的优势所在,也是本研究所做的初步努力之一。

农村籍学生中较为成功者在生存心态上未必一定转型,其原因在于农村籍学生生存心态与精英高等教育机构生存心态之间所存在的部分匹配提供了农村籍学生一定的缓冲空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个人的社会流动是个全面的过程,它包含了个人在新的环境中的更广范围内的探索。很多研究都显示,弱势群体的学生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生存心态的持续转型,对于他们积累文化和社会资源、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进而顺利地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0]因此,从实践方面来说,我们需要强调农村籍学生生存心态全面转变在个人社会流动过程中的重要性。也正因如此,本研究实践方面的具体启示是,在农村籍学生进入新环境的开始,高校就可以考虑开展更有针对性的入学培训工作;或者在他们进入高校之前,在高中

阶段就设立有关的衔接课程,引导他们对高校环境发展新的更为全面的认识,尤其是针对社会生活方面的安排;在高校中,相关的机构如学生会、团委等组织,也可以更加积极地招纳农村籍学生,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这一类组织的工作,上述工作应当能够推动农村籍学生实现生存心态的转变。在理解农村籍学生的生存心态转变这一微观过程时,我们也需回归宏观的社会结构,从当代中国城乡权力关系的基本格局来理解微观个体正在经历的生存心态的变化。

参考文献:

- [1] Xie A. Inside the College Gate: Rural Students and Their Academic and Social Success [J]. Chinese Education & Society, 2015, (2); 孙晓利. 北大等名校农村娃所占比例缘何越来越少 [N]. 广州日报, 2013-10-16.
- [2] 孙晓利. 北大等名校农村娃所占比例缘何越来越少 [N]. 广州日报, 2013-10-16.
- [3] Li H. Rural Students' Experiences in a Chinese Elite University: Capital, Habitus and Practices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3, (5—6).

[4] 余秀兰. 从被动融入到主动整合: 农村籍大学生的城市适应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0, (8).

[5] Horvat E M, Davis J E. Schools as sites for Transformation: Exploring the Contribution of Habitus [J]. Youth & Society, 2011, (1).

[6] Li H. Rural Students' Experiences in a Chinese Elite University: Capital, Habitus and Practices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013, (5—6); Aries E, Seider M.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 Identity and the College Experience: The Case of Lower Income Students [J]. Qualitative Sociology, 2005, (4); Bourdieu P. Reproduction [M]. London: Sage, 1990. 53.

[7] Reay D. Finding or Losing Yourself? : Working-class Relationships to Education [J].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2001, (4).

[8] Hurst A L. The Burden of Academic Success: Loyalists, Renegades, and Double Agents [M]. Lexington Books, 2010.

[9] Reay D, et al. "Fitting in" or "Standing out": Working-class Students in UK Higher Education [J]. British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2010, (1).

[10] Stuber J M. Inside the College Gates: How Class and Culture Matter in Higher Education [M]. Lexington Books, 2011. (163—170); Liu D. University Graduates and the Job Search in Urban China: An Examination of the Culture of Personal Advancement [D].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4. 197—209.

Rural Students in China's Elite Universities: Social Mobility and Habitus Transformation

Xie Ailei

Abstract: The study on habitus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is an important area. The social and culture experiences of a group of rural students in four elite universities of China (985 project universities) are investigated. It is found that, when rural students entering elite milieu, there is matching in some extent between their existing habitus and new environment. Their inadaptation is mainly from social life. There are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between the quondam habitus and the new habitus of rural students. The sense of security and self-confidence caused by "continuity" can become their important chance to widen the new field, realize their own habitus transformation, and exceed the "discontinuity". However, "continuity", just like a double-edged sword, can also become the important obstruction to prevent rural students from transforming their habitus.

Key words: elite university, rural students, habitus

Author: Xie Ailei, adjunct professor of China Institute of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North East Normal University, & postdoctoral fellow of 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angchun 130024)

[责任编辑:杨雅文]